

全球史视域与二十世纪的东亚：评《漫长的 20 世纪》 | 《区域动态》3 月第 3 期

摘要：乔瓦尼·阿瑞吉在《漫长的 20 世纪》中构建了以“体系积累周期”为核心的宏观历史框架，其核心命题之一在于揭示：资本主义霸权在由“物质扩张”转入“金融扩张”的阶段即步入危机，并由此开启体制转换的序幕。本文在简要梳理以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为中心的四个积累周期及其“保护成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依次内部化逻辑的基础上，重点考察该理论对二十世纪东亚，尤其战后日本崛起及其结构性局限的解释力。文章指出，日本通过转包合同制度构建起高效率的区域生产网络，但在军事与金融权力上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美元—安全体系，难以完成从“商业国家”向“世界霸权”的跃迁。进而，本文讨论阿瑞吉与布罗代尔、马克思、韦伯等人的理论对话，评估其关于“金钱与权力关系”的宏观叙事在连接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方面的启发意义。同时也指出，该理论因过度侧重经济周期的循环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区域内部的历史能动性。通过这一评述，本文尝试说明阿瑞吉的世界体系视角如何有助于重新思考东亚经验及其在当代全球秩序变迁中的位置。

《漫长的 20 世纪》作者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接受过系统且完整的经济学训练，这为他的论著奠定了坚实的量化和理论分析基础。他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特伦斯·霍普金斯等人同为世界体系分析学派的核心人物。其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与宏观历史分析，尤为强调长时段、大尺度的历史变迁。本书作为一种书写全球史的独特视角，阿瑞吉的研究不仅仅是对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继承，更是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空间化重构。

在该书绪论中阿瑞吉首先就自身理论来源进行了陈述，并与布罗代尔和马克思等人的理论进行了对话。正文第一章提出并论述了几个重要概念，如“世界霸权”、“资本主义与领土主义”、“金融扩张”、“体系积累周期”、“剩余资本”与“立国活动”等。随后的第二三四章中对四个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结束语部分则是他对霸权转移可能性的论述。

阿瑞吉对《漫长的 20 世纪》的构思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

该书的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历了四个环环相扣的“体系积累周期”，每一周期的终结阶段都伴随着“金融扩张”，这不仅是危机的信号，更是霸权即将转移的序幕。本篇书评旨在深入解析这一理论框架。我们将首先回溯阿瑞吉所论述的四个历史周期的特征；随后重点探讨他如何运用此框架分析美国霸权的危机，以及 20 世纪日本的崛起及其结构性局限；最后，本文将梳理阿瑞吉与布罗代尔、马克思、韦伯等思想家的理论对话，并分析其研究范式的启发性所在与有待商榷之处。

一、历史的回溯

作者认为中世纪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城邦国家的地区性亚体系的形成过程是“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源”。这一周期的特征是保护成本外部化：高度专门化的国际资产阶级（“金融民族”）与同样高度专门化的领土主义国家结成同盟，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领土主义联合统治集团。国际资产阶级负责管理国际货币和大部分远程贸易；领土主义国家负责生产提供保护和短途贸易。

第二个体系积累周期是以荷兰为中心的商业体系。其范围从地区发展成全球的过程由三项互相关联的政策共同推动和支撑，包括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和世界商业的货物集散中心、金融和资本中心和创办特许股份公司。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实现了保护成本内部化：在使用和控制武力方面，这些公司采用自给自足和提高竞争力的办法来“提供”自我保护。

至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通过恢复伊比利亚帝国主义和热那亚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组织结构来实现生产成本内部化，即“生产活动被纳入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范畴，并服从这类企业所固有的成本最小化取向”。此前两个周期的主要资本主义企业都从事远程贸易和大规模的金融活动，尽可能把生产活动排斥在他们的组织范畴之外；而英国周期中，资本积累是建立在积极参与组织生产过程，并进行合理化改革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上。

美国周期的标志性特点是交易成本内部化。原先由各个企业单位之间的活动和交易被放在一个单一的组织内部，使纵向合并的多单位企业能够降低并更加精确地计算交易成本，即通过联结最初生产和最终消费的组织机构的长链降低相关的中间投入成本。英国霸权下，没有任何组织具有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支配世界体

系的能力。美国霸权的体制大大限制了主权国家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安排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与自己国民的关系的权利和权力。由此，四个体系积累周期在金融扩张阶段依次实现了“保护成本外部化”、“保护成本内部化”、“生产成本内部化”、“交易成本内部化”。

总体来看，该书的主线仍然是“金钱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塑造了世界的经济与政治格局。阿瑞吉在前言中提到，他原本计划论述“民族国家体系的创立和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这两个相互依存的主要进程”；在最后成文的书稿中，主线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与演变，民族国家体系的创立的线索成为了“暗流”。该书的创新之处也恰恰在于其以打破民族国家历史的叙事框架，以全球史的视角去分析“漫长的 20 世纪”。

二、二十世纪的东亚

在结束语部分作者论及了关于美国霸权向以日本为中心的体系转移的可能性与限制因素。作者指出，二战后美国组建的超国家组织在形势压力下被唤醒履职。但是，在“积累过剩危机的程度和严重性以及它蔓延的速度”的局面下，“创建最低有效程度的世界政府结构的任务，超出了美国和其盟国的能力范围。”与此同时，东亚取代北美成为世界资本积累过程最富活力的中心。作者认为日本资本主义机构的最重要的活力来源之一是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转包合同制，这一体制具有松散的纵向联合的竞争优势。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业增长率无法衡量资本主义经济争夺的成败，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经济附加值的等级和剩余资本等级的向上流动，而日本的这两个指标在东亚最为突出。由此，日本经济的升级是整个东亚地区工业扩张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阿瑞吉认为日本的转包合同制是一种比美国福特主义更具效率和灵活性的生产组织模式，它通过金字塔式的层级网络，将风险和成本向下转移，使得以丰田、新日铁等为代表的核心企业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和成本优势生产出高质量的工业品。这种强大的物质扩张能力，是日本在战后崛起并对美国工业霸权构成严峻挑战的重要原因。然而，也正如后世所观察到的，日本没有完整的立国和战争能力，其繁荣源于对美国体系的附庸，因此很大程度受制于美国的资本和军事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通过以《广场协议》为代表的金融和贸易手段，成功遏制

了日本经济的强劲势头。由此，日本在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战略自主性时面临一种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

一方面，日本的经济雄心仍然受制于地缘政治。正如阿瑞吉的理论所预示的，日本强大的工业机器产生了巨大的能源需求和资本过剩。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以产业界巨头为核心的“资源开发派”通过民间外交积极推动与苏联的合作，承担了具体的试探和协商工作，成为推动西伯利亚开发的关键力量。他们渴望通过达成与苏联和中国的合作，从而共同开发自然资源来解决日本面临的能源危机，摆脱对中东和美国控制航道的过度依赖。尽管日本进行了追求经济自主的战略尝试，但日本并未成功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转向金融扩张，即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重新确立了其全球领导地位。如阿瑞吉所指出的，霸权的维系和更迭并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效率。当一个霸权国家在物质扩张领域面临挑战时，它可以转向金融扩张来重新巩固其领导地位。面对日本和德国在制造业上的挑战，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主动放弃了部分生产优势，转而通过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将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自己拥有绝对优势的金融领域。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则构建起了一个东亚的区域生产体系，且“嵌套”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之内。然而，东亚经济的繁荣越是依赖出口，就越是加深了对美国消费市场的依赖。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日本之所以无法取代美国霸权，根源在于其权力的不完整性和依附性。日本是一个成功的商业国家，但从未能成为一个能够制定全球规则、并拥有军事和金融上强制力的霸权国家。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94年，当时关于以日本是否能取代美国霸权的问题，作者认为前景仍然“还不清楚”。2009年再版之时作者也仍然持保留态度。

三、理论对话

阿瑞吉的宏大叙事建立在与一系列经典理论家的深入对话之上，他对前人思想批判性继承的同时也有一定创新与发展。

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分是阿瑞吉的理论基石。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是透明的和竞争性的日常交换，而“资本主义”则是

上层的、垄断的和投机的“反市场”。阿瑞吉则将此历史化和动态化。他提出的“物质扩张”阶段即是市场经济主导的繁荣期，而“金融扩张”阶段则是布罗代尔式的“资本主义”，或称投机性的高层金融，在物质扩张利润耗尽后，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阿瑞吉的循环模式是马克思资本总公式在世界体系层面的历史展现。阿瑞吉将资本积累的“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视为一个完整周期的两个阶段。当物质扩张的利润率下降、剩余资本无法找到有利可图的生产性投资时，资本便会回归其流动的货币形式，寻求金融投机，从而引发金融扩张。这既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也将其从阶级分析扩展到了国家霸权更迭的宏大历史叙事。

大卫·哈维与阿瑞吉理论的关联在于他们共同观察到了 1970 年代以来权力重心从主权的民族国家转移到了流动的、跨国的金融资本手中。但他们对于这一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转向的解释路径不同。哈维认为，这是资本家阶级为解决利润率危机、恢复阶级权力而发起的政治工程，即新自由主义。而阿瑞吉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复现。金融扩张并非全新的政治发明，而是美国霸权进入其周期性“秋季”的必然信号，一如 19 世纪末的英国。

阿瑞吉对于“金钱与权力的关系”这一核心主线的论述则直接回应了马克思·韦伯关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区分。与韦伯倾向于将（国家）军事权力与（经济）资本权力视为自主逻辑不同，阿瑞吉的核心论点是，霸权的本质恰恰是这两种逻辑的暂时性融合。霸权诞生恰恰在于它能整合“领土主义”的国家利益与“资本主义”的普遍利益；而霸权的危机则是这两种逻辑重新分离的时刻。

阿瑞吉在该书以及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将亚当·斯密视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家，而非“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斯密所设想的“自然的”发展道路被阿瑞吉视为一种与西方霸权路径截然不同的模式。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发展都遵循了斯密所批评的“非自然的”道路，即商业和金融主导。通过与斯密的理论对话，阿瑞吉得以在书的结尾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东亚的发展，是否代表了一种更接近斯密“市场经济”理想的模式，从而可能终结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循环？

阿瑞吉的理论的精彩之处在于其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或单纯的经济决定论，通过引入“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互动，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演进的深层动力。但同时该书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首先，阿瑞吉在论述中

过度关注流通领域和金融高地，而忽视了底层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其二，阿瑞吉一定程度忽视了全球史中的“边缘”地区的能动性。尽管阿瑞吉在晚年试图通过《亚当·斯密在北京》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但他所使用的核心概念依然深深植根于西方经验。其三，尽管阿瑞吉预测了美元体系的脆弱性和美国霸权的终结，但近年来的数据展示了比他预想更为复杂的图景，即全球金融网络对美元的路径依赖仍然比预期的更具韧性。这些不足不仅源于理论抽象过程中的必然简化，也源于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对模型提出的挑战。

小结

总体看来，阿瑞吉构建起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进程的可能的模型。这种历史社会学的模型是书写全球史的一种视角，也是整合区域研究的一种重要切口，成功地架起了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桥梁。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常易陷入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内部因素的具体描述，而忽视了外部结构性力量；而宏观的世界体系理论，又常被批评过于抽象和理想化，忽视了不同文明和国家的能动性。尽管我们并不认为阿瑞吉的理论是绝对完善的，但他确实以全球史的视角、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在这种动态的、关系性的分析视角下，研究者将去追问：特定国家或区域的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如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生产组织模式，是如何在与全球霸权体系的互动、调适、博弈乃至对抗中形成的？它又是如何反过来利用体系的周期性危机，去尝试重塑自身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每一个“国别”研究都从孤立的个案提融入到了全球史的宏大叙事之中，使其成为理解世界体系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

段晓婧，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